

“编”若不再，“制”当何存

■本报记者 陈彬 韩理

“专业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编制故，两者皆可抛。”

徐明昆是北京某高校的一名教师。两年前，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那篇博客的标题为《编制比什么兴趣科学更有吸引力》。

不可否认，如今青年学者进入高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能解决编制，可以使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稳定。就连对编制持批判态度的徐明昆也在文章中承认，“我们包括我，也爱编制，就像老鼠爱大米”。

然而，不久前，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可能导致未来北京市高校的新增教师再也吃不到编制这份“大米”了。

相似管理导致相似问题

北京市的这份《意见》是这样规定的：今后，北京市对现有高等学校、公立医院将保留其事业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对现有编内人员实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

据了解，中国高校中出现“编制”一说最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大量高校被收归国有，高校教师也就转身成为“国家干部”。

“所谓编制人员，也就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政府人员和大学教师是同样性质的。直到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之后，才有了一些区分。不过教师不再是公务员，政府却还是大学的主办者。高校内部的一些人还在以公务员的方式管理。

“之所以大学有编制，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政府在办学，政府与大学之间没有太大区别。”储朝晖说。

于是，在相似的性质、相似的管理方式之下，高校也就出现了和政府机关相似的问题。

在博客中，徐明昆这样形容编制对高校人员造成的弊端：“观察编制内之人，和体制外的人/外国人相比，普遍戴上一个模糊、圆滑的面具，缺失敢爱敢恨、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灵魂。”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徐明昆表示，编制也导致了高校人员流动的困难。“有编制的人不能因能力不行而开除，有能力的人又因为没有编制而无法引进，这就造成了人员流动的壁垒。国外教育单位之所以能使人员流动起来，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壁垒。”

刘青两年前刚刚进入一所大学工作。对于手中的编制，他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态度。

“谁都喜欢编制。”在采访中，他说，毕竟如果有编制，人就稳定了。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现在高校中太多的“衙门化”倾向，太多的“鱼目混珠”也是编制造成的。“有了编制就可以不再上进，为了能在编制体系里混得更好，就必须圆滑世故。如此下去，的确是个问题。”

对于刘青的这段话，徐明昆在博客中是这样概述的——编制不死，中国的科研就只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那么，北京市的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一刀切”可行吗

需要注意的是，在《意见》中，对高校编制改

“终身教授制是一个专业筛选的过程，而编制则只是一种无限权利的享受。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专业的独立评价机制，也许编制可以起到部分终身教职的作用，但如果评价机制问题不解决，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导的方式，那么编制就只是“大锅饭”。

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



革的规定是“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对此，北京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改革的总体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对于这种改革方式，徐明昆并不以为然。“如果取消的话，最好能够大范围地同时取消，逐步取消很容易导致高校和教师被其他利益因素所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他说，事实上，这些年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试图逐步缩减编制，但并没有收到多好的效果。

对此，有评论表示，逐步收回事业编制，意味着高校会长期存在两种身份——事业身份和合同工。且不说待遇公平、同岗同酬如何保证，单是双方的心态平衡问题就十分难处理。“临时工心态”“变相铁饭碗心态”等也会影响聘任制人员工作的开展。

储朝晖也认为，目前这种“退一个收一个”的方法的确很慢。“现在20多岁的年轻教师还要三四年后才能退休。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渐进式方法收效慢，那么，整体“一刀切”的做法可行吗？

“至少现阶段是不太现实的。”储朝晖表示，毕竟目前政府与高校间还存在依赖关系，只有政府与高校真正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关系，才能够说高校不需要政府的编制了。“很显然，北京市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力，要做到这点至少要修改《高等教育法》，而短期内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如果将目光放得稍微长远一点，这样的做法是否完全不可行呢？

2004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全部国立大学进行法人制度改革，让各大学从吃“皇粮”的行政机构转型为市场化的运营法人。目前，这一颇类似国内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经完成了第一期中期

计划。“他们的做法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最终这样选择，就是认定了靠政府办学不是好的政策。”储朝晖说。

编制≈终身教职？

对于像刘青这样的年轻教师来说，对于究竟是谁管理大学这样的深奥问题，他们并不是很在意。相比之下，他们更在意的是——如果没有了编制，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

曾有一位博士毕业生收到了两份高校的入职通知，一份位于省城，条件相对较好，但要等评上副教授后才给编制；另一份虽然条件稍差，但入职即给编制。他有些犹豫该选哪个，为此特意在网上发帖征求意见。

最终，在总计60条的回复中，只有一条认为编制“不是很重要”，而支持他选择后者的网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有编制，没压力。

“所谓没压力，也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国外的终身教职一样。很多人就是想要这种环境。”刘青说。

这种环境也是西南某高校教师徐腾飞当初走进大学教书的重要原因。采访中，他表示，对自己而言，编制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鼓励一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气氛。“我更喜欢把编制看成一个‘终身教职’，有它的存在，教师可以相对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

事实上，将编制“约等于”终身教职的人并非只有徐腾飞和网络上的那几十名网友，虽然他们都明白，编制和终身教职有太多的差别。

据徐腾飞介绍，终身教职制度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高校人事制度，其设计包括两个阶段，即成为终身教职之前与成为终身

教职之后。

“一般来说，副教授及以上职位可以拿到终身教职，而讲师或者助理教授则还在走向终身教职的路上。”他说，第一阶段，大学会要求教师在一定年限内证明自己的教学研究实力。其考核相当严厉，淘汰率也很高。而当教师证明自身实力并拿到终身教职后，来自学校的学术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他们也可以自由从事研究。

“简而言之，终身制包括两个部分：证明实力与学术自由。这两部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而编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前半部分的缺失。”徐腾飞说。

对此，储朝晖也表示同意。

“终身教授制是一个专业筛选的过程，而编制则只是一种无限权利的享受。”他说，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专业的独立评价机制，也许编制可以起到部分终身教职的作用，但如果评价机制问题不解决，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导的方式，那么编制就只是“大锅饭”。

牵一发能否不动全身

当编制提供的便利不再存在时，年轻人想到的是为何还要进大学，而高校也会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拿什么吸引优秀人才进高校？

“吸引年轻人，肯定要靠提高收入。”储朝晖说，“目前高校年轻老师是在低收入的状态下工作的，这个状态不可持续，也导致了高校职位缺乏竞争力。”

然而，提高收入并不是说一谈那么简单。

目前，国内公立高校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中央以及各级财政的直接拨款。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占到公共财政总支出的15.8%，已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再通过大幅度提升教育支出从而提高教师收入显然并不现实。而除此之外，国内高校的其他筹资渠道并不发达。

“美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高校，由于大部分都是相对独立的私立高校，可以采取更多形式的融资手段，而且国外高校的教育捐助系统也要发达得多，这保证了他们的资金来源。国内高校则很难做到这点。”刘青说，换言之，要想大范围大幅度地提升教师收入，高等教育必须作出一系列改变。

相对于工资的提高，徐腾飞更为看重的是高校能否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科研环境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部分，硬件部分通过投资相对容易解决，软件部分包括了学术氛围、人事制度与行政服务等，并非一时能够改变。”他说。

眼下，徐腾飞正在国外访学。据他观察，缺乏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行政服务，是很多科研人员回国的最大禁忌之一。如果编制取消的同时，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的归国之路很可能会更加坎坷。

在采访中，储朝晖一直强调，编制问题其实只是高等教育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但这一环节却牵扯到整个体系的诸多环节。“高等教育是一个整体，一方面的变化就要求整个大系统都必须跟着变。但现在，我们却是在不想改变大系统的前提下，只作这一点改变。”

然而，牵一发，真的可以不动全身吗？

要想彻底地根除野鸡大学，多部门联动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而根植在人们心中的金钱文凭观更需要通过深化教育公平来打破。

400名学生超修学分险致无法毕业

上个月底，媒体曝出某大学因忘开必修课，导致60名大学生无法毕业。本月又曝出一则新闻，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因超修学分，须在5月30日前补缴学分费，否则无法拿到毕业证。

实际上，东北师大早在2010年就开始试行学分制收费管理，并且该院超修学分的学生逐年增多。为何5年后，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日趋严重？

一般来说，即使没有收费的规定，学生也不会愿意超修过多的学分，就算一些学生对部分课程感兴趣，也大多以旁听、蹭课的形式进行。问题出在学校的几率更大。而在随后东北师大的回应中，也证实了由于教学管理不完善，选课系统缺少必要的提示，导致了400名超修学分的。最后，校方免除了这些学生的超修学分费用。

透过上述两个事件，我们有理由质疑高校办学的责任心，而在后一个事件里，也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鼓励学生多学习是一件好事，高校有必要针对学生超修的学分收取费用吗？

显然，高校并不指望通过超修学分挣钱。这种以学分代替学制的管理，对于修满学分即可提前毕业者固然有一定帮助，但是对于正常毕业者起到的鼓励作用有限。它很容易将超修学分的学生摆在一个受质疑的角色——超修学分，尤其是修比较容易得高分的课程，有拉高分绩点之嫌。另外，由于按学分收费（一个学分在80至110元不等），也不利于鼓励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而这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恐怕也是一大困扰。（温才妃）

中国大学评论

1995年左右，中国高等教育界几位重要人物如杨叔子、王义道、张岂之、胡显章、周远清等先生在大陆积极倡导并以持续的艰苦工作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转眼20年已经过去，素质教育的思想和灵魂逐步渗入中国高校中，在教育观念、课程、教学组织模式、学生学习、校园文化、课外实践等诸多方面引发润物细无声的变革，成为推动高等教育进步的重要观念和力量。20年弹指一挥间，但如果将其放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史背景中，在同样的时间长度中比较，比如1952年至1972年、1972年至1992年，20年就显得特别漫长，但这种漫长更加凸显出素质教育的旺盛生命力以及生命力背后的教育规律。可以说，素质教育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史不得不关注的重要主题。

2015年5月15日~17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暨全国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20周年”研讨会，对20年素质教育的经验有所总结，并在纪念的基础上尝试前瞻。

“文化素质教育”是大陆教育界的本土概念，这一概念与通识教育和自由教育的内涵十分接近。如果为了方便中西理解和交流，将其统一称为“通识教育”也无不妥。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为通识教育赋予新的本土内涵。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将精力用于争论概念的优劣，不能进入“文字障”。

近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发出了给高考学生的信，在信中他对清华的教育宗旨有所概述：“清华实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强调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自主发展有机结合。通识教育为你打下宽厚的基础，着力强调人格养成和价值塑造，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团队精神。去年，学校成立新雅书院，旨在继承和发扬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传统，打造一流的通识教育平台。”从以上概述以及新雅书院的成立中，我们清晰地体会到素质教育对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组织模式方面的根本性影响。

正如邱勇所言，素质教育从其方向上看大体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能力、态度、价值观的方向，综合而言就是心智培养的方向。学生训练成熟的心智可以在未来适应和引领不断变化的世界。

红衣主教纽曼对心智训练的目标曾有论述。他说：“这种训练教导学生作为受过教育的绅士要学会看清事物的本质，要学会直击要害抓住中心，要能厘清思想的因循混乱，要能辨别出什么是精深奇妙的以及什么是毫不相关而要摒弃的”，这当然是心智训练极高的要求。在心智训练的目标下，知识并不重要，知识仅仅只是达到心智训练的一种载体而已。

大学经由何种教育才能实现心智训练的目标呢？如何将课程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我们能够仅通过通识教育达成心智训练目标吗？当然不够，专业课程教师同样保持持心智训练的目标，其课程也能训练心智。当然，数学、物理、语言、哲学、历史等基础学科专业能够较好地完成任务，职业性强的专业比较难些而已。在心智训练方面，仅有课程远远不够，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接触、对话更加重要，这是导师制存在的原因，也是慕课等网络教育难以实现的目标。

文化素质教育的第二个方向较为简单地指向知识和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在对立统一中存在。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赞成这样的划分。他说：“大学在知识学习上应该深度及广度兼备。一方面应该通过专业课程对某一知识体系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应该对其他领域广泛涉猎。”其中，广泛涉猎就是通识教育的目标。基于以上看法，许多大学将课程就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两类，这是比较经典的课程划分。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共存互补的关系可以通过太极图清晰描述，其中“圆”作为整体代表大学期待学生形成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中的课程分为阴阳两个方面。如果阳的方面称为通识教育，阴的方面就是专业教育。这种互补的图示可简单称为“通识教育阴阳互补论”。

在太极图中，阴之中孕育着阳，阳之中孕育着阴，这意味着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非绝对地两元划分和对立——专业课程包含通识教育元素，反之亦然。学生一旦在大学转专业，比如机械专业的学生转为中文专业，那么其先前所修机械、物理课程自然转变成通识课程。中文专业的学生选修了物理学，这种“通识课”专业课，后者自然也是货真价实的通识课程。有些高校常纠结于通识课程质量不高，但这样的认识使得通识课程的范围在理念上几乎扩大到所有专业课，这一点也是大学必须促进并方便学生跨院系自由选课、自由转专业的道理所在。另一方面的例子在于，某学生A作为生物专业的学生选择了“中国哲学史”的通识课而引发出哲学兴趣，他转到了哲学专业，于是通识课程“中国哲学史”就转变为他的专业课。

更加重要的情况是，一旦某专业的毕业生选择了与其本科专业不同的新职业，其本科所有课程都会转变为通识课程。前几日，《人民日报》报道“北大学子建太空翼足球教育作儿童足球培训”，其主人公是元培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蒋沈雄。蒋沈雄是经济学专业而不是体育相关专业出身，但其选择的足球学校教练和经理生涯几乎将一半经济学专业课程转变为通识课程。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将在路上继续前行，培养出更多好的公民和创新者。以中国传统思想理解和解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理解与实践。

素质教育在路上

■卢晓东

壹月教评

北京市属高校减招1000人

5月19日，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根据该通知，今年北京市属高校的招生总计划为8.3万人，比去年减少了1000人左右。据了解，今年减招将重点压缩京外招生规模。多所市属高校招办负责人透露，今年的要求是“京外招生数”比去年再减10%。

实际上，早在2007年前后，由于北京生源持续减少，政府曾一度鼓励市属高校扩招外地生源。然而，这一政策自去年起悄然发生变化，由于近年来北京人口规模剧增，北京市出台了控制人口规模政策，风向已然从“扩招”转为“压缩”京外生源。



孙梦涛和他的65个证书。图片来源: 百度图片

背后的原因不在于北京生源较外地生源优异，更主要是因为就业压力的倒逼。有关数据显示，在北京市的20个行业中，只有银行业籍人员就业率过半。就在上个月初，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表“以业控人”言论，鼓励用人单位更多吸纳北京户籍的劳动者就业，还引起了一阵骚动。

向上追溯则是减少留京的毕业生，再往前推就是减少京外生源。市属高校为地方服务，因此要多招本地生源，听起来逻辑是没有问题。但是，随之也会产生新问题。比如，一个班级绝大部分是本地生源，容易造成大学生视野狭窄、盲目自大、适应性差、包容性不强等问题，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都市，显然这并不是培养人才的初衷。

对于“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言，高等教育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只做简单的加减法。

大学生狂揽65证书 难找工作

河南一名三本院校大学生孙梦涛最近很是郁闷。他成绩优异、社会实践丰富，临毕业时只是整理出来的获奖证书就有65个，堆起来足足有1.3米高。但即便如此，从今年3月至媒体曝光前，他投出了50多份简历，仍无一面试通知。

大部分人都惊讶于这65个证书，感叹如此优秀的小伙子居然没有公司聘用，继而将矛头对准了用人单位对三本院校的歧视。实际上，在随后曝光的证书清单中，孙梦涛的荣誉证书居然有35个，与职业相关的证书仅有6个，多为计算机二级证、普通话证这类含金量不足的证书。因此，又有人质疑这是一场媒体刻意将能力与学历作比较的炒作。

65个证书足以说明一件事，孙梦涛的综合素质优秀。但是，找不着工作与三本出身并不能直接画等号。这里存在着多种可能：用人单位更看

重三本院校毕业生的职业能力，而孙梦涛与职业相关的证书含金量不足；找到一份工作不难，但是找一份好工作有点难，“高不成，低不就”的心态导致他高估了自己的定位；当然，歧视三本院校也是一种可能，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当今就业中，这也是他无力改变的。

所幸的是，孙梦涛得到这65个证书的过程，并不像许多公立高校中的大学生那样，为了考证而考证，他用4年的时间活出了最精彩的样子，这才是数字背后最值得鼓励的精神。假以时日，他的上进精神必定也能在用人单位放大。

210所野鸡大学名单曝光

临近招生季，高校为了招生各出奇招，而这时也往往是野鸡大学最活跃的时刻。然而，今年国内野鸡大学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了。

不久前，上大学网陆续发布了三期“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曝光了国内210所虚假大学。而就在5月21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公布了2845所正规高等院校。

野鸡大学，很多人不是第一次听说，为何屡禁不止，让人很是疑惑。就像皮包公司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称，成为这类不具招生资格、没有办学资质、涉嫌非法招生或网络诈骗的虚假大学的生存之道。往往发现野鸡大学猫腻的时候，也是出问题的时候，而这时它们早已逃之一空。

冷静地想一想，考生、家长要发现当中的猫腻其实并不困难。比如，上教育部网站查询。但是，又有多少人想到这么做？那么，不妨想一想现行的教育体制、观念有什么漏洞，一方面，野鸡大学处于监管、查处的空白地带，一旦出事多部门推诿成为常态，学生、家长申诉无门；而在另一方面，不少人相信录取中的潜规则，认为用钱来换文凭理所当然，这使得野鸡大学有机可乘。